

全克林 / 著

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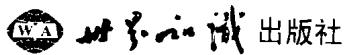
Britain and
the Arab - Jewish
Conflict

与阿—犹冲突
1945-1949

桂林工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英国与阿—犹冲突 (1945—1949)

全克林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与阿—犹冲突:1945~1949 / 全克林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012-3467-7

I.英… II.全… III.英国—对外政策—巴基斯坦—研究—1945~1949 IV.D8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4570 号

责任编辑 龚玲琳 颜 楠
责任出版 林 琦 刘 菲

书 名 英国与阿—犹冲突
Yingguo yu A—You Chongtu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排版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80×1230 毫米 $\frac{1}{32}$ 14 $\frac{1}{2}$ 印张

字 数 46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1 月第一版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3467-7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一、选题意义

二战以来，中东^①一直是世界政治中的一大热点地区：数十年来这一地区已经发生了多次大规模战争，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则不计其数；难民问题久拖不决；恐怖主义活动难以消除，相反还呈现出扩散之势。所有这些都给当地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有关中东是世界上“最不稳定、最混乱和最令人费解”的地区之一的说法毫不夸张。^②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和关键。^③ 长期以来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和平努力一直没有停止，但都收效甚微，这一问题距离彻底解决仍然遥遥无期，而当前所有难题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二战

① “中东”(Middle East)、“近东”(Near East)和“中近东”(Middle and Near East)三个概念常常互换使用。近东一词最早出现于地理大发现时代，当时西方人将地中海以东的东方世界按距离远近分别称为远东(Far East)和近东(Near East)，近东一般指1453年以后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地区。中东一词出现于20世纪早期，当时大致指俾路支(Baluchi)以西的亚洲和北非地区。1921年1月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出任英国殖民大臣后在殖民部设立“中东事务司”(Middle East Department)。二战后，“中东”一词开始广泛使用。美国国务院的近东事务司(Bureau of Near Eastern Affairs)负责处理美国与“阿尔及利亚、巴林、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等国家和地理实体有关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关系事务”。见 <http://www.state.gov/p/nea/>。但除此机构名称之外，美国官方基本上将上述诸国都称为“中东”国家。也有学者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也归入中东地区。

② Dan Tschirgi, *The Politics of Indecision: Origins and Implications of American Involvement with the Palestine Problem* (New York, 1983), p. 258.

③ Donald Neff, *Fallen Pillars: U. S. Policy towards Palestine and Israel since 1945* (Washington, D. C., 1995), p. 1; 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页。

后初期所发生的冲突。

1945—1949 年是巴勒斯坦冲突演变的关键时期。二战结束后，绵延数十年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冲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民族主义都不断高涨，一方基于 1000 多年来的居住权要求让巴勒斯坦成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而另一方则根据其与巴勒斯坦的历史联系、《贝尔福宣言》和国际联盟的承诺要求让这块“上帝应许之地”成为所有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对立双方的要求无法调和。此外，外部力量的介入使巴勒斯坦成为一个国际问题。阿—犹冲突在这一时期最终演变成大规模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这场战争的影响极其深远，不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数十万人沦为难民，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的力量格局。

英国与巴勒斯坦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英国长久以来就是中东的主导大国，一战后，英国成为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国，开始了长达 30 年（1918—1948）的直接统治。在 1948 年 5 月委任统治结束之前，英国在巴勒斯坦冲突中扮演了双重角色：它既是仲裁方，同时又是冲突的直接参与方，而且事实上英国与阿拉伯人或是犹太人中一方的矛盾和冲突经常比阿犹之间的冲突更为激烈，在撤出巴勒斯坦之后，英国虽然退居幕后，但仍然通过它与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外约旦）的联系以及它在联合国的地位影响着冲突发展的方向。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英国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深刻地影响阿—犹冲突。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巴勒斯坦冲突对于英国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所导致的英国撤出巴勒斯坦是英帝国在中东衰落的链条的第一环，这标志着中东旧秩序终结过程的开始。对这一时期英国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动因的专题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阿—以冲突的发展进程，理清巴勒斯坦的阿犹双方、阿拉伯国家以及英、美、苏等大国之间的极其复杂的政策互动，把握战后英国的外交战略，以及理解这一时期的“英美特殊关系”。此外，在当前巴勒斯坦冲突再度激化的情况下，对问题的根源进行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研究现状

阿—犹冲突的演变和发展是影响英国巴勒斯坦政策的主要因素，

同时,英国对阿—犹冲突的政策是在冷战从萌芽到逐渐升温的国际大环境下制订和执行的,也是英国与其他大国政策直接和间接互动的产物,因此本书对研究现状的总结主要包括几个方面:1. 对1945—1949年间阿—犹冲突的研究;2. 英国对阿—犹冲突政策的研究;3. 其他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巴勒斯坦政策。最后是国内研究现状和总结。

(一)对1945—1949年间阿—犹冲突的研究

学术界对于战后初期阿—犹冲突的研究已较为深入,取得了很多成果。

谢弗德认为英国在犹太复国主义最脆弱的时期保护了它在巴勒斯坦的“滩头阵地”,这是委任统治在政治上的重要遗产。^① 纳粹大屠杀使犹太复国主义者感到一种建立自己国家的道义上的紧迫感,^② 而阿拉伯人民族意识的提高也使他们更坚决地要求英国让巴勒斯坦完全自治^③。因此,阿博什认为巴勒斯坦的悲剧在于它是一种只能走极端路线的“零和游戏”,^④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妥协。

关于阿犹双方的成败及其原因,科恩认为犹太人依靠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游说活动以及自身军事成功和管理技巧,利用大国矛盾和阿拉伯人的不团结,抓住历史机遇得以建国。^⑤ 阿博什认为决定犹太复国主义者取得胜利的是两个因素:军事胜利(在巴勒斯坦当地)和外交胜利(在国际舞台上),而前者最为重要。“以色列在成为一个政治现实之前就已是一个军事现实,主要是军事现实帮助它获得了政治承认”。^⑥ 戈尔布也强调了以色列取得的军事胜利的决定意义。^⑦ 马塔尔

^① Naomi Shepherd, *Ploughing Sand: British Rule in Palestine, 1917 ~ 1948* (London, 1999), p. 244.

^② Michael Cohen, “The Jewish Perspective,” in Louis and Stokey (eds.), *The End of the Palestine Mandate* (Austin, 1986), p. 100.

^③ David Sanders, *Losing An Empire, Finding A Role: An Introduction to Brit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1945* (New York, 1990), pp. 78 ~ 79.

^④ W. F. Abboushi, *The Unmaking of Palestine* (Boulder, 1985), p. xi.

^⑤ Michael Cohen, “The Jewish Perspective,” in Louis and Stokey (eds.), *The End of the Palestine Mandate* (Austin, 1986), p. 101.

^⑥ W. F. Abboushi, *The Unmaking of Palestine* (Boulder, 1985), p. 194.

^⑦ Leslie Gelb, *Anglo - American Relations, 1945 ~ 1949: Toward a Theory of Alliances* (New York, 1988), p. 127.

利用最新材料,对穆夫提的地位进行了重新评估,认为以穆夫提为首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领导层采取激进的“拒绝”政策导致了阿拉伯人的失败。^① 卡利迪认为巴勒斯坦人的失败源于犹太人军事上的优势、所有大国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敌视或漠不关心、某些阿拉伯国家与英国和犹太人共谋对付他们以及他们自己的不断失败。^②

戈尔纳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分析了阿—犹冲突的实质,认为这一冲突是在19世纪帝国主义和20世纪非殖民化大背景下阿拉伯和犹太两个民族寻求民族认同和自决的结果,冲突有其自身的根源,尽管受到国际环境的重要影响,但从根本上说,它不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③

第一次中东战争是阿—犹关系中“最具破坏性”的事件,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④ 近年来随着有关档案文件的开放,各国学者利用新的材料对战争的历史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打破了許多“神话”,如犹太人对战争毫无准备、以少胜多、阿拉伯国家的联盟大而强并且一直在为入侵做准备等^⑤,最新研究表明阿拉伯国家的联盟是“战争史上最不团结、最无组织和最混乱的联盟”^⑥,内斗使阿拉伯国家在这个关键历史时期只实现了“最低限度的合作”。^⑦ 阿拉伯世界内部的争夺对冲突的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弗拉潘认为这一阶段的冲突在军事上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战争,但在政治上是一场阿拉伯人对

① Philip Mattar, *The Mufti of Jerusalem: Al - Hajj Amin al - Husayni and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New York , 1988) , pp. 109, 123 – 124.

② Rashid Khalidi, “The Palestinians and 1948: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Failure,” in Rogan and Shlaim (eds.), *The War for Palestine* (Cambridge , 2001) , p. 13.

③ Deborah Gerner, *One Land, Two Peoples: the Conflict over Palestine* (Boulder , 1994) , p. 3.

④ Simha Flapan, *The Birth of Israel: Myths and Realities* (New York , 1987) , p. 4.

⑤ [以]梅厄:《梅厄夫人自传》,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页;Howard Morley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 , 1979) , p. 317; N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New York , 1975) , pp. 247, 249.

⑥ Avi Shlaim, “Israel and the Arab Coalition of 1948,” in Rogan and Shlaim (eds.), *The War for Palestine* (Cambridge , 2001) , pp. 83, 97 – 99; Thomas Mayer, “Arab Unity of Action and the Palestine Question, 1945 – 48,” in Lustick (ed.), *Triumph and Catastrophe* (New York / London , 1994) , pp. 161 – 176.

⑦ Joseph Nevo, “The Arabs of Palestine,” in Lustick (ed.), *Triumph and Catastrophe* (New York / London , 1994) , p. 243.

阿拉伯人的战争。^① 关于难民问题的根源,以色列“正统”的说法是阿拉伯人自己应对此负责,^②但莫里斯的研究发现很多情况下巴勒斯坦人是被犹太人用暴力逐出家园的^③。鲁宾认为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远非世人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激进和不妥协。^④

(二)英国对阿—犹冲突政策的研究

柯克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编写的《国际事务概览,1945—1950年的中东》^⑤于1954年出版,是最早的关于这一时期英国巴勒斯坦政策的学术著作之一,该书使用了大量文献和资料,立场也较为中肯,一直受到研究者重视。蒙罗也对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进行了精辟的分析。^⑥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英国40年代的档案文件陆续解密,西方学界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在80年代出现了一个高潮,科恩、刘易斯、琼斯、纳赫玛尼和帕贝等人的一批有分量的作品^⑦相继问世,英国主要决策者贝文和艾德礼的传记也包括了对巴勒斯坦政策的阐述。^⑧

从80年代后期至今,专门研究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的作品很少,但这一时期有许多关于阿—犹冲突的研究成果问世,由于英国与冲突息息相关,它们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英国的政策,从不同侧面提供了更全面和深入了解英国政策的新视角。80年代后半期以来,斯林姆、弗拉

① Simha Flapan, *The Birth of Israel* (New York, 1987), p. 150.

② Noah Luc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Israel* (New York, 1975), p. 253.

③ Benny Morris, *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e Refugee Problem, 1947—1949* (New York, 1988), p. 90.

④ Barry Rubin, *The Arab States and the Palestine Conflict* (New York, 1981), pp. 2, 12—13.

⑤ [英]柯克:《1945—1950年的中东》(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⑥ Elizabeth Monroe, *Britain's Moment in the Middle East, 1914—1971* (Baltimore, 1981).

⑦ Michael Cohen, *Palestine and the Great Powers, 1945—1948* (Princeton, 1982); William Roger Louis,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1945—1951: Arab Nation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Post-war Imperialism* (Oxford, 1984); Martin Jones, *Failure in Palestine: British and United States Polic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New York, 1986); Amikam Nachmani, *Great Power Discord in Palestine* (London, 1987); Ilan Pappe, *Britain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1948—51* (London, 1988).

⑧ 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 (New York, 1985); Kenneth Harris, *Attlee* (London, 1982).

潘、帕贝、莫里斯等人利用以色列新开放的档案(尤其是本—古里安的日志以及以色列军方档案)所进行的研究事实上颠覆了许多长久以来在人们头脑中业已根深蒂固的观点,因此他们被称为“修正派”历史学家或是“新史学家”。这些新观点促使阿拉伯人、以色列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对阿—以冲突的起源进行重新思考,并推动学者们对这一领域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修正派”的崛起也在史学界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论战,卡什是“反‘修正派’”的主要代表,他驳斥“新史学家”的专著于1997年问世并很快于2000年再版。卡什的研究(也是基于档案文件)集中驳斥了关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起源的解释以及有关英—犹—约“共谋”在外约旦和以色列之间瓜分巴勒斯坦的观点,他断然否认“大外约旦”共识的存在,并认为称贝文为以色列的“守护神”是毫无根据的,他认为“从1947年2月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一直到战争结束,贝文和他的顾问以及英国内阁都坚定支持阿拉伯事业,甚至将其失败视为自己的失败”。^①这场论争仍在继续。

1. 对英国政策的总体评价

帕贝称1946年以后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几乎毫无计划^②,谢弗德称从巴勒斯坦撤出可能是英国政府最耻辱的撤退^③,哈利斯尖锐地指出英国“毫无原则和极不明智”地从巴勒斯坦撤出,是艾德礼执政记录中最大的败笔^④。但也有人视撤出巴勒斯坦为英国外交的成就之一。肯尼迪认为1945—1951年是英国对外政策最成功的时期之一,工党上台时面临包括动荡不安的巴勒斯坦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但到1951年时,这些问题大都已经得到解决。^⑤

2. 关于贝文的“美国倡议”

贝文一心想拉美国一道在巴勒斯坦承担责任,这一努力的结果是成立了英美调查委员会,自此美国正式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科恩与沃特强调了英国对美国的依赖。科恩认为“英国在跨大西洋同盟中的弱

^① Efraim Karsh, *Fabricating Israeli History: The “New Historians”* (London, 2000), pp. 200–203.

^② Ilan Pappe, *Britain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1948–51* (London, 1988), p. 7.

^③ Naomi Shepherd, *Ploughing Sand* (London, 1999), p. 5.

^④ Kenneth Harris, *Attlee* (London, 1982), p. 399.

^⑤ Paul Kennedy,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London, 1981), p. 362.

势地位使它至少绝对依赖于美国默许其政策”，然而问题是美国政府在国家利益和国内政治之间游移不定，从未制订出能成为与英国合作基础的单一和连贯的政策。^① 沃特认为贝文和艾德礼特别渴望美国人接受并支持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当贝文意识到在巴勒斯坦不可能依靠美国时，他就决定结束委任统治。^② 施奈辛格认为成立调查委员会是英国企图在难民问题上拖延时间，^③ 科恩认为英国寻求美国合作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成功，但却是以英国在阿拉伯世界战略利益严重受损为代价^④。

比雷认为尽管有利益冲突，英美在中东“压倒一切的共同目标”是在最大程度上将苏联影响力排除在这一地区之外。^⑤ 但纳赫玛尼从纯粹现实主义的视角来考察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提出完全对立的观点，他认为以色列建国是英美争夺的结果：贝文视美国介入为维系英国地位的手段，但美国介入却意在削弱这种地位。^⑥

沃特对“美英特殊关系”的总结是，任何研究 20 世纪美英关系的历史学家只会有两种感觉：或者为美英合作所取得的不容置疑的成就感到骄傲，但难免会有失败和失望的感觉；或者为“美英特殊关系”的“神话”所具有的诱惑力感到怒不可遏。^⑦ 研究 1945—1949 年在英美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政策互动的学者的感觉应该是后者。

3. 关于提交联合国和撤出巴勒斯坦

艾德礼称他和贝文在 1947 年 2 月决定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是因为已经决定放弃委任统治并撤出，^⑧ 但学界对英国此举的动机

① Michael Cohen, *Palestine and the Great Powers* (Princeton, 1982), p. 391.

② Donald Cameron Watt, *Succeeding John Bull: America in Britain's Place, 1900 – 1975* (Cambridge, 1984), p. 107.

③ John Snetsinger, *Truman, the Jewish Vote and the Creation of Israel* (Stanford, 1974), p. 22.

④ Michael Cohen, *Palestine to Israel* (London, 1988), p. 195.

⑤ Harold Beeley, “The Middle East,” in Louis and Bull (eds.),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45* (Oxford, 1986), p. 286.

⑥ Amikam Nachmani, *Great Power Discord in Palestine* (London, 1987), pp. 274, 41.

⑦ Donald Cameron Watt, *Succeeding John Bull: America in Britain's Place, 1900 – 1975* (Cambridge, 1984), p. 158.

⑧ Francis Williams (ed.), *A Prime Minister Remembers: The War and Post-war Memoirs of the Rt. Hon. Earl Attlee* (London, 1961), p. 201.

有不同看法。琼斯认同艾德礼的说法，认为提交联合国不是拖延战术，而是一个“没有政策的政府”的最后手段，^①布洛克也不同意贝文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只不过是个“诡计”的说法^②。然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当时把问题提交联合国并不意味着英国已经决定放弃委任统治，蒙罗、金奇、刘易斯和赛拉都认为当时英国并没有最后决定撤出，提交联合国是英国迫使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让步的“策略”。^③

关于英国撤出巴勒斯坦的原因，阿巴迪认为战后经济虚弱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④威尔逊也认为经济弱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后英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政策，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不及经济因素^⑤。但布莱克维尔对经济决定论提出了置疑，认为英国从海外撤回是迫于无法承受的“外部压力”，它制订外交政策时的主要关切是保持其世界大国权力而不是帮助国内经济摆脱困境。^⑥ 塞格夫强调了美国因素，认为正是意识到犹太人能够影响美国的政策促使英国放弃巴勒斯坦。^⑦ 哈达利强调了犹太非法移民活动的影响。^⑧ 赛拉认为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失败还与决策的参与者都缺乏对巴勒斯坦的深入了解有

① Martin Jones, *Failure in Palestine* (London/New York, 1986), p. 185.

② 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 – 1951* (New York, 1985), p. 367.

③ Elizabeth Monroe, *Britain's Moment in the Middle East, 1914 – 1971* (Baltimore, 1981), pp. 163, 168; Jon and David Kimche, *Both sides of the Hill: Britain and the Palestine War* (London, 1960), p. 29; William Roger Louis,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1945 – 1951* (Oxford, 1984), p. 462; Avraham Sela, “*Britain and the Palestine Question, 1945 – 1948*,” in Cohen and Kolinsky (eds.), *Demise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Portland, 1998), pp. 236 – 237.

④ Jacob Abadi, *Britain's Withdrawal from the Middle East, 1947 – 1971: The Economic and Strategic Imperatives* (Princeton, 1982), p. 2.

⑤ Rodney Wilson, “Economic Aspects of Arab Nationalism,” in Cohen and Kolinsky (eds.), *Demise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Portland, 1998), p. 76.

⑥ Michael Blackwell, *Clinging to Grandeur: British Attitudes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Westport, 1993), p. 93.

⑦ Tom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Jews and Arabs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 (London, 2000), p. 489.

⑧ Zeev Venia Hadari, *Second Exodus: The Full Story of Jewish Illegal Immigration to Palestine, 1945 – 1948* (London, 1991), p. viii.

关。^① 桑德斯认为英国撤出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断增长的当地民族主义力量以及英国已经无力维持秩序。^② 科恩则作了更全面的总结：战后英国经济破产；无力诱使美国达成共识，相反美国不断进行干涉和施压；委任统治受到严重破坏以及非法移民活动愈演愈烈。^③

4. 关于英国与“大外约旦计划”

这一时期阿—犹冲突导致了以色列建国，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部分并没有如联合国分治决议规定的那样成为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而是被邻国外约旦兼并。这一问题长期以来是研究的热点之一。大多数学者接受的一个观点是英国不愿意看到出现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它至少默许了外约旦国王阿卜杜勒和犹太人之间达成的共识：外约旦不进攻犹太国，犹太人则不反对他兼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领土（“大外约旦计划”）。伊万诺夫和谢尼斯认为英国在1948—1949年有双重目的，如果可能，重返巴勒斯坦建立某种形式的托管，若失败也不允许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而是把它并入臣服的约旦。^④ 刘易斯认为英国接受和推动“大外约旦计划”的根本动机不在于报复犹太人，而是确保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力长期存在，^⑤ 金奇也认为英国这样做是希望重获对巴勒斯坦事务的主导权^⑥。斯林姆提出了“共谋说”：巴勒斯坦分治不是在联合国，而是由阿卜杜勒和他的犹太共谋者决定的，鉴于在确保外约旦遵守与犹太人共识方面所起的作用，贝文是以色列的“守护神”。^⑦ 这从根本上颠覆了贝文是犹太人建国理想“死敌”的传统观点。帕贝提出，1948年以后，英国和外约旦在巴勒斯坦利益一致，

① Avraham Sela, “Britain and the Palestine Question, 1945 – 1948,” in Cohen and Kolin-sky (eds.), *Demise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Portland, 1998), p. 242.

② David Sanders, *Losing An Empire, Finding A Role* (New York, 1990), p. 81.

③ Michael Cohen, *Palestine to Israel* (London, 1988), pp. 185, 195, 220.

④ [苏]伊万诺夫、谢尼斯：《以色列的局势和政策》(马广志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12—17页。

⑤ William Roger Louis,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1945 – 1951* (Oxford, 1984), pp. 373 – 374.

⑥ Jon and David Kimche, *Both sides of the Hill* (London, 1960), pp. 39, 277.

⑦ Avi Shlaim, *Collusion Across the Jordan: King Abdullah,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Partition of Palestine* (New York, 1988), p. 618.

它接受了外约旦兼并阿拉伯区作为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①

赛拉认为外约旦和以色列的共识“脆弱”且“短命”，^②但帕贝认为阿卜杜勒既成功地主导了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的行动，又维持了与犹太人的谅解^③。

琼斯对“大外约旦计划”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在分治决议通过后，英国政策最具破坏性的一面在于它对阿卜杜勒的态度：纵容阿卜杜勒兼并划给阿拉伯人的土地不仅破坏了阿拉伯团结，而且还导致阿—犹冲突升级。^④弗拉潘认为阿拉伯国家出兵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消灭以色列，而是在于阻止犹太人与阿卜杜勒实施他们的共识，^⑤索恩希尔同意这种说法^⑥。

5. 关于英国的阿拉伯政策

赛拉认为决定撤出表明英国决策者使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从属于其总体阿拉伯政策。^⑦金奇认为英国的政策是避免损害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为此得罪美国和犹太人也在所不惜。^⑧在琼斯看来，委任统治末期英国的政策是一个“极大的失败”，因为外交部一味维护阿拉伯国家团结而没有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向其施压以获得问题的和平解决。英国在巴勒斯坦遭到失败，而阿拉伯团结也没有实现。^⑨蒙罗也认为如果英国对阿拉伯国家采取一些“冒险性行动”，那么它放弃委任统治的

① Ilan Pappe, *Britain and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 1948 – 1951* (London, 1988), p. ix; Ilan Pappe, *The Making of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 1947 – 1951* (London/New York, 1992), pp. ix, xii.

② Avraham Sela, “Britain and the Palestine Question, 1945 – 1948,” in Cohen and Kolinsky (eds.), *Demise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Portland, 1998), p. 241.

③ Ilan Pappe, *The Making of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 1947 – 1951* (London/New York, 1992), p. 122; Ilan Pappe, *Britain and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 1948 – 1951* (London, 1988), p. 72.

④ Martin Jones, *Failure in Palestine* (London/New York, 1986), pp. 309 – 310, 346.

⑤ Simha Flapan, *The Birth of Israel* (London, 1987), p. 9.

⑥ Michael Thornhill, “Britain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Arab League,” in Cohen and Kolinsky (eds.), *Demise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Portland, 1998), p. 58.

⑦ Avraham Sela, “Britain and the Palestine Question, 1945 – 1948,” in Cohen and Kolinsky (eds.), *Demise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Portland, 1998), p. 237.

⑧ Jon and David Kimche, *Both sides of the Hill* (London, 1960), p. 274.

⑨ Martin Jones, *Failure in Palestine* (London/New York, 1986), pp. 344 – 346.

后果也不至于如此糟糕。^① 这些观点代表了西方学者当中一种较为普遍的轻视阿拉伯人利益的倾向(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英国从巴勒斯坦撤出最直接和明显的后果是导致了它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衰败。^②

(三)其他大国的巴勒斯坦政策

1. 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

杜鲁门在阿—犹冲突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关于这一时期美国政策的研究大都围绕杜鲁门展开,同时这也是引发激烈争论的一个领域。施奈辛格认为杜鲁门的巴勒斯坦政策是“将外交政策基于缺乏远见的政治实利而非国家长远目标之上的最好例子”,^③威尔逊最初认为杜鲁门推行亲犹政策是出于对犹太难民的人道主义关切,但在研究了档案文件后认为杜鲁门对国内政治的关切远超过其他因素^④。麦克拉弗则称杜鲁门支持以色列是基于长远的道义、伦理和历史的原则,^⑤本森也认为杜鲁门的政策是“出于对受迫害的犹太少数民族道义和伦理上的强烈同情,尽管当时国际和国内战略方面的理由都促使他不要那样做”^⑥。值得一提的是纳赫玛尼的研究,他认为虽然普遍看法是美国的政策是犹太人压力的结果,但事实恰好相反,杜鲁门得以利用犹太人的压力推行自己的计划:“美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是其政策的手段而非起因或目标”。^⑦而科恩得出了一种“中庸”的结论,认为杜鲁门的基本思想是“难民锡安主义”(refugee Zionism),它要求英国让犹太难民进入巴勒斯坦,但这种理念“并不包括也没有导致杜鲁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建国理想”。^⑧ 克利斯登森强调了“参照系”(frame

① Elizabeth Monroe, *Britain's Moment in the Middle East, 1914 - 1971* (Baltimore, 1981), p. 168.

② David Sanders, *Losing An Empire, Finding A Role* (New York, 1990), p. 81.

③ John Snetsinger, *Truman, the Jewish Vote and the Creation of Israel* (Stanford, 1974), p. 140.

④ Evan Wilson, *Decision on Palestine: How the U. S. Came to Recognize Israel* (Stanford, 1979), p. 149.

⑤ David McCullough, *Truman* (New York, 1992), p. 196.

⑥ Michael Benson, *Harry S. Truman and the Founding of Israel* (Westport, 1997), p. xi.

⑦ Amikam Nachmani, *Great Power Discord in Palestine* (London, 1987), p. 41.

⑧ Michael Cohen, *Truman and Israel* (Berkeley, 1990), p. 277.

of reference)在美国决策者头脑中的重要作用。^① 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美国没有坚定和长期的巴勒斯坦政策。^②

2. 苏联的巴勒斯坦政策

关于苏联的巴勒斯坦政策的研究由于苏联方面的材料有限,著述尚不多。

苏联的支持对于联合国通过分治决议和犹太人在战争中获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这一时期苏联推行亲犹政策的原因何在一直是学界争论的一个问题。拉克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对于苏联最高领导层只是一个“次要问题”,他们从未对此给予太多的关注,支持分治的决定可能并非最高层的决策,而是外交部顾问的建议被斯大林在不经意间批准。^③ 但卡利迪认为1947—1948年间的所有事件都表明苏联的政策是“精心算计和长远谋划”的结果,^④ 金奇认为苏联插手巴勒斯坦是贝文力图拉美国介入的结果^⑤。克兰默认为苏联帮助犹太人可能是因为它低估了阿拉伯世界的潜在力量和反西方情绪,高估了支持以色列可能带来的好处。^⑥ 但无论如何,鉴于英国最终狼狈撤出巴勒斯坦,这算得上是斯大林最成功的外交攻势之一。^⑦

(四)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学术界对战后初期英国对阿—犹冲突政策的关注与其重要性极不相称,目前尚无人对这一问题做过专题研究。一些涉及这一问题的著作认为:战后由于国力衰落,英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美

^① Kathleen Christenson, *Perceptions of Palestine: Their Influence on U. S. Middle East Policy* (Berkeley, 1999), p. 73.

^② Kathleen Christenson, *Perceptions of Palestine* (Berkeley, 1999), p. 91; Michael Cohen, *Truman and Israel* (Berkeley, 1990), pp. 91, 277; Martin Jones, *Failure in Palestine* (London/New York, 1986), p. 308; Dan Tschirgi, *The Politics of Indecision* (New York, 1983), p. 175.

^③ Walter Laqueur,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1959), pp. 146—147.

^④ Walid Khalidi, *Palestine Reborn* (London & New York, 1992), p. 67.

^⑤ Jon and David Kimche, *Both sides of the Hill* (London, 1960), p. 275.

^⑥ Arnold Krammer, “Soviet Motives in the Partition of Palestine, 1947—1948,” in Lustick (ed.), *Triumph and Catastrophe* (New York/London, 1994), p. 159.

^⑦ Ole Smolansky, “The Soviet Role in the Emergence of Israel,” in Louis and Stookey (eds.), *The End of the Palestine Mandate* (Austin, 1986), p. 75.

苏开始掌握国际事务支配权，英国已经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决定其前殖民地的独立程序和方式；美国亲犹政策的实质是把犹太复国运动纳入其战后排斥英法、抗衡苏联、称雄世界的全球战略轨道，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美国在巴勒斯坦的首要任务是利用英犹矛盾，加剧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困境并迫使其尽快撤出，同时又以阿—犹冲突为杠杆，把巴勒斯坦变成美国的势力范围；以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霸主自居的美国对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宗主国地位提出挑战，主要手段是支持犹太人的反英斗争，从而打破此前的英、犹、阿三方力量对比大致均衡的局面，使巴勒斯坦的局势朝更有利于犹太人的方向发展；二战后美国利用其膨胀起来的经济实力和中东国家与英法殖民主义的矛盾不断排挤、削弱并逐步取代英法在中东的地位；美国为了实现其争霸全球的野心，极力扩大在中东的势力范围，而巴勒斯坦问题就成为美国插手中东的契机；苏联承认以色列反映了美苏在主张巴勒斯坦分治和排挤英国势力这一点上立场是一致的。^① 这些观点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从美国视角看英国的政策，将英国政策过于简单化，英国被描绘为面对内外压力束手无策，其主动性被忽视。

（五）总结

1945—1949年是巴勒斯坦冲突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英国的政策经历了重大转变：从坚持委任统治到从巴勒斯坦完全撤出；从全力“绥靖”阿拉伯国家到不顾阿拉伯国家的反对而全力支持“大外约旦计划”，进而承认以色列；从全力拉美国介入到抛开美国独自寻找解决办法最后再回到寻求美国合作的老路上；从被迫撤出而后又试图通过“大外约旦计划”实现“有限重返”巴勒斯坦。但综观现有研究，迄今为止很少有人对这一时期英国政策的发展和演变从总体上作出完整的动态分析和全面概括。现有研究对于这一时期中东总体战略和英美政策互动对英国决策的影响分析显得薄弱。此外，现有研究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也还存在缺陷，如将英国政策失败归因于“对阿拉伯政策的

^① 见周琪、王国明主编：《战后西欧四大国外交》，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0页；李援朝：《中东问题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 99—100页；王京烈主编：《动荡中东多视角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页；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失败”的论点未能解释为什么“大约旦计划”提出前英国不愿意“得罪”阿拉伯国家，而之后却明知阿拉伯国家反对而全力支持该计划，关于英国对阿拉伯国家实施武器禁运的原因也未能作出全面的解释。

三、本书使用的主要材料与主要观点

(一) 本书所使用的主要材料

1. 档案文件。阿什顿(S. R. Ashton)主编的《帝国终结文件集》自1992年起陆续出版，该系列文件集A系列的第二卷《工党政府与帝国终结，1945—1951》^①中收录了许多关于战后初期巴勒斯坦问题的文件，包括内阁备忘录和决议以及外交部、殖民部、国防部等部门的备忘录等档案，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英国政策具有重大价值。另一套极有价值的英国档案文件《英国外交事务文件：外交部机密报告和文件集》^②的战后初期部分也于1999年出版，其中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部分（第四部分B系列的第一、二、四、六、八卷）不仅收录了外交部内部的备忘录、纪要和研究报告等文件，还收录了英国驻外使节发回外交部的报告和评估文件，外交部官员与外国官员的谈话记录和往来函电。除了英国政府文件之外，本书使用的另一套大型文件集是《美国外交文件》^③。此外，本书还使用了《美国总统公共文书》以及有关阿—以冲突的其他各类文件集。

《英国外交事务文件：外交部机密报告和文件集》此前尚未被国内研究者用于战后初期阿—以冲突的研究。这些材料的使用，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2. 专著和论文集。本书的研究是在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所参考的专著和论文集主要来自：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资料室、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图书馆、南京

① Ronald Hyam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The Labour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45 – 1951* (London: HMSO, 1992).

② 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 (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9).

③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5 – 1949* (Washington, D. C.: GPO, 1969 – 1977).